

杨晓华：从1979年首次登泰山以来，您坚持登泰山，一往情深，老而弥笃。您和泰山为何有如此深厚之缘分？

杨辛：中国文化哺育的每个人都和泰山有着一定的精神联系。我们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稳如泰山”“安如泰山”“泰山压顶”“泰山北斗”“有眼不识泰山”“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熟语，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在汉语的古文字中，泰与“大”“太”同义，在中国人看来，泰山几乎就是“平安”“伟大”“崇高”的同义词，所以孟子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1979年，中华美学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和武汉大学刘纪纲教授同游泰山。在岱顶，我们晚上住在2元钱一宿的简陋棚子里，但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看到了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泰山日出，激动不已。从此，我被泰山的雄伟深深折服，每年坚持登山，有的年份不止一次，到现在总计42次，其中徒步登山37次。80多岁以后，我坐车到中天门再往上登。今年我还准备再去。每一次登山，我都经历一次精神的沐浴和更新。如今虽是92岁，仍然觉得心志顽强，精神不老，这和泰山给我的激励直接相关。

杨晓华：不仅是登泰山，作为一个美学家，先生还参与到了泰山文化的研究、创造和发扬之中。先生认为泰山是“华夏之魂”。中国的古文字为数量众多，各有千秋，为什么先生独对泰山有如此崇高的评价？

杨辛：早年我登泰山，主要还是从亲近自然，怡情悦性的角度感受泰山。1986年，泰山准备申请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北大受命进行学术论证，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我负责美学方面。1987年泰山申遗成功，我们的报告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好的一份。正是在准备报告期间，我有幸从不同路径、不同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体会泰山，我对泰山的认识、超越个人的心志体验而进入学术文化的梳理、鉴赏和阐发当中。

我认为，在自然美中有两种美的类型，一是壮美，一是优美，或称作“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泰山是阳刚之美，这种阳刚之美具有自然风貌的基础；泰山“拔地通天”，周围平原丘陵形成强烈对比；泰山山势累叠，如大海巨澜，从一天门到中天门再到南天门，一浪高过一浪，气势磅礴，节奏鲜明。《诗经》中以“泰山岩岩”状之，实乃传神妙语；泰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巨大雕塑，基础宽阔，形体浑厚，沉稳稳重，可谓“泰山如坐”；泰山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要岩体，巨石交叠，形貌多姿，赫然矗立，动人心魄；泰山的苍松郁郁葱葱，虬枝峥嵘，占谷为林，顺风成韵，美不胜收；泰山的万壑烟霞呼吸天地，流动嬗变，清代叶燮形容是“天地之至文”。泰山的壮美虽然以自然美为基础，

700多年以前，在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的杭州，在元兵压境，危亡在即的时候，爱国诗人郑思肖写了《德祐二年元旦二首》。其一曰：

力不胜于胆，逢人双泪垂。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
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这是我读到的诗中最早提到“中国梦”的记录。诗写得很悲怆，大意是说，在这无力挽救亡国命运的时候，只有垂泪向人。心里萦回着强国之梦，脑子里叨念着《诗经》中的下泉之诗。离人较近的太阳还看得见，遥不可及的高天就无法去打听了。我天天朝着南方抗元的义军旗帜，希望他们能凯旋回来。《下泉诗》是《诗经·曹风》的篇名，主要表现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作者郑思肖(1241—1318年)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名与字皆宋亡后所取。“思肖”，即思念赵宋之意。“所南”，表示以南为住所。他画兰花，露其根而不画土，表示土地已被掠夺。诗中强烈地表现出遭民“麦秀”“黍离”之悲情，是忠贞爱国的义士之悲歌。虽面对泰山压顶的危机，却仍保持坚贞不屈的斗志。这种极可宝贵的爱国情怀，正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源。它同刘琨于建兴五年(317年)写给司马睿的《进表》所言：“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亡以启圣明”之思路一脉相承而放射出光芒万丈。

郑思肖五百来首诗作大多精彩悲壮，其述梦之作，尤为杰出。如《李靖天瓢图》：“梦里龙腾出入荒，扫空热恼作清凉。不消数滴天瓢雨，洗净娑婆透骨香。”其《自挽诗》云：“堂堂男子不封侯，与命为仇死不休。陷府有歌春梦断，哭天无地夜魂愁。九清风露极玄处，万古虚空自在游。痛恨英生报国晚，从今割爱薄南州。”另如《补梦中作》：“鸿雁流离梦亦惊，满怀凄怨足秋声。此身不死胡儿手，留与君王取太平。”“忠愤爱国之情，结想成梦，上海天日。宋亡以后他抱遗民之节决不承认元朝年号。”《偶成》云：“梦中亦闻朝廷事，诗后唯书德祐年。”《过徐子方书塾》云：“不知今日月，但梦梦山川。”爱国之情可裂金石。

陆游，作为一位伟大爱国诗人还拈出了“中国梦”之语。淳熙十一年(1184年)

杨辛先生简介

杨辛，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美学家。1922年5月生，1947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美学教育和研究，1960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1989年至1990年任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全国高等学校美学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杨辛和甘霖合著的《美学原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广泛的美学教材之一，至今已重印40多次。

近日，本报记者在北京杨辛先生寓所对其进行采访，在此刊发，以饕读者。

但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凝结和丰富。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宏大构思，道路、溪水与山谷的妙合无垠，人文建构与自然景物的浑然一体，这一切一方面深化了泰山壮美的主体风格，另一方面增加了泰山娱人怡情的玄机和妙趣，使得泰山山具有了天、地、人亲密无间，相互依仗，相互激发的空灵和博大的境界。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外，华夏之魂。”这是我对泰山最见性情的描写。这首诗被做成泰山的摩崖石刻，据说在当地已经广为流行了。

杨晓华：您还认为人们对泰山的审美方式存在历史的阶段性变迁。

杨辛：这种变迁经历了“自然崇拜”“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民智未开，自然神秘而庄严，人们对大山的伟岸、雄壮和气象万千产生深深的敬畏，人们希望从山的恩赐和保护中获得财富和力量，泰山因为结合了太阳崇拜，具有了更加崇高的地位，连汉武帝刘彻都对着泰山击节赞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

“比德”作为一种观物方式，在春秋战国就较为普遍。《诗经》中的比兴，《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即是明证。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因为山的安稳、厚重和仁者的敦厚相似，大山蕴藏万物，好比仁者施惠于人。在这种关照中，山的特点和人的精神世界互相映照，成为伦理秩序和文化力量的象征。

在前两种认知中，都存在一定的美空间，但是审美是依附性的，自然和道德感严还有可能造成对人的精神世

界的侷促和压制。大约在魏晋时期，中国的审美意识逐步走向独立。曹植《飞龙篇》云：“晨游泰山，云雾窈窕。”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审美世界。唐代杜甫《望岳》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已经从自然审美的激发中产生了人生体验的豪迈和超越。南宋宗炳所谓“峰岫峩峩，丛林森渺……万趣融其深中……畅神而已”。当然，在历史上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交错的。

杨晓华：泰山被定为“五岳独尊”，这种地位有着明确的典籍根据吗？这种地位的获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文化的？

杨辛：泰山又称东岳，在五岳当中，海拔是第三位，它之所以获得“五岳独尊”的地位，主要是历史文化的缘故。中国人崇拜太阳，太阳温暖、光明，普照人间，滋养万物。泰山耸立于齐鲁平原，东临苍茫大海。海上日出，泰山之巅是想象中最早可以观瞻到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对太阳的崇拜转化为对泰山的尊崇。《史记集解》载：“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这种尊崇，后来就导致帝王封禅，泰山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记》记载，在秦始皇之前就曾有72个帝王在泰山祭祀。帝王的祭祀活动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泰山崇拜心理，一般学者认为，最迟在汉代，五岳之说、泰山之尊就确定了。

岳岳之见，泰山的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刻，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人文价值可以探究。首先从政治而言，泰山

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丝残，心未死。”悲情烈烈，感动天地。梁启超《读陆放翁集》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就是对陆游极为中肯的评价。

南宋时代以匡复中原为人生奋斗理想的诗人很多。辛弃疾就是一位寝梦不忘祖国的伟大斗士。他在《水龙吟》中高唱：“……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气象何等发皇壮伟。其《破阵子》更是一首记梦杰作。中云：“梦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发生。”读之令人血脉贲张，可以忘死。

以上这些述梦诗，大多作于国族危难之际。哭吐精诚，是为了唤醒大众奋起救亡。千百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志士成仁取义。毛泽东的掀天揭地的诗词中，也有两首述梦之作，就别开生面，与此不同了。一首是作于1959年6月的《到韶山中》，开篇便说：“别梦依稀忆逝川，故国三十二年前”，这是对可诅咒的黑暗旧社会的批判，而其结句则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表现了对沸腾生活的赞美。1961年写的《答友人》以“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起笔，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开慧烈士的思念。结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则浓墨重彩讴歌了新中国生气勃勃的壮美画图，体现了一种史诗般的宏伟气象，令读者大受鼓舞，打叠起向上的勇气去为理想而奋斗。

斗转星移，回黄转绿。经过百年苦难的考验，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勇立潮头，奋发进取，已成为世界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和世界和平安乐的保护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国梦”感到信心百倍，力量无穷。做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自信和豪迈。



杨辛先生近影 杨晓华 摄

通天接地，是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象征，是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的表现。其次，从哲学上讲，泰山构筑了天人交契的博大时空，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民族生命力的象征。第三，从伦理学上讲，泰山包容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厚重、宽容的人格精神。第四，从美学上讲，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体呈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具有宏伟远大的气魄。从这几方面考察，泰山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和黄河一样，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质朴、刚健、进取、智慧和坚韧。

杨晓华：作为学者，您超越了普通的游嬉心态，对泰山文化的解解丰富而深刻，您还身体力行参与到了对泰山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之中。我想知道，就您个人而言，是什么让您如此动情地亲近泰山、颂扬泰山？

杨辛：前几年，我和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同去泰山。清华建筑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您可否用一个词来概括泰山对您的最深刻的影响？”我竟一时凝塞。后来还是从哲学上想到，这个词应该是“生命”。

泰山文化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天人之学，其最大魅力就是能激发人的生命力。对个体和国家皆是如此。儒家经典《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向天地学习就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泰山的因缘改变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在泰山，最惊魂摄魄的体验就是观泰山日出。泰山日出不是温和、秀雅，

以妖娆示人，而是在天风莽荡、云涛汹涌中腾跃而起，喷薄而出，刹那间光芒万丈。这是一曲壮美的生命的赞歌。李白观其大美而言道：“平明登日观，举首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我登泰山共有七八次看到日出，其中只有两三次看得最充分。

不仅是日出。还有泰山松，其生存条件最为酷劣——泰山是坚硬的石头山，缺少泥土。泰山松生长在石缝中，破石为土，云雾作乳，硬是从石头缝里的贫瘠泥土中汲取营养而生长。

泰山挑山工，则是人文存在中最直接的显象。他们是泰山孕育的优秀子民，“性实在，不谈心；步步高，担担重，汉如泉，劲如松；顶烈日，迎寒风，春到夏，秋到冬”。

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段我疾病染身、形销骨立、体重只有43公斤，甚有颓唐萧瑟之感。但是我坚持登泰山、感受泰山，向泰山学习，十分幸运地走出了生命的低谷。

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气象熏陶和激发了我的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激励了我的学术、文化生命。我的美学思想、书法、诗歌作品，超越桑榆晚境的困限，得有持续的精进和升华。我为泰山写了30多首诗歌，新出版的《全泰山诗》即选了29首。我有诗云：人生七十也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生命从自然中来自然中去，似如圆周转，不必设定终点，任何一点都可以是起点。即使个体生命结束了，也可以融入大宇宙，与日月同光，天地同寿。

杨晓华：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思想还是丰富的文化意蕴，作为一座大山，这一切都只有在登临之中才会有真切的体验，这应该是您不断攀登的原因所在。

杨辛：的确如此。泰山文化是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融合的官员认为，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融合得这样好，是中国人的一大创造。但是“泰山之妙在于登”登山的乐趣不仅在于目标极顶，在真切的攀登之中，历史文化、天人幽思，才会溶入自己的血液，化为充沛的精神气脉。在攀登中，人和自然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山势险峻，路在山谷，道奇且险，但人心平稳，仿佛在泰山的怀抱中亲切地拾级而上，真正体验到“雄而可亲”。人与人之间显得分外和谐，登山中你少看见愁眉苦脸，即使很累人们也是面带笑容，汗水相

1981年3月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已连续举办了八届，先后彰显了1977年至2010年间的38部长篇小说。这个奖项从举办以来，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回望这8届茅奖评选及获奖作品，平心而论，它还是以在众多的作品中选优拔萃的方式，遴选出了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较好地反映了长篇小说30年来的崛起状况。

近期，中国作家莫言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经过几轮激烈竞争，最终荣获此奖。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为

的评述与研究，就不再是一个空白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选题既适逢其时，又独步天下，堪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着妙棋。

这部研读茅奖作品的著作，不独以选题的补弱弥缺与角度的先人一步而取胜，它在基本内容构成的两个大的方面，还有着其构成而易见的优良与值得关注的意义。

其一，是由具体评介与系统扫描构成了一份独特的茅奖作品基本档案。

茅奖自1982年起评奖，连续评选了8届，涉及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又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社会脉动

密切相连。作品背后，有一定的文学活动支撑；文学背后，又有一定的社会生活依托。因此，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学奖项的茅盾文学奖，其蕴有的内涵与意义，实际上远远地超出了文学奖。在这本论著里，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只缺最新的一届），对茅奖获奖作品依次进行评介，既有较为精细的逐个作品的评述，介绍了每届获奖作品的各自特色，又依循评说，在整体上描述出了茅奖评选的整体演进。在这里，具体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景，不同作品有不同作品的样貌，但总体来看，又有茅奖自身发展演进及其所标志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力行进与一路高歌的基本态势。这种横向上有具体的作品评介，纵向上又有总体的发展情形，使得这部论著在对茅奖作品的评述上，除去其既有的评论性、学理性之外，显然还有一种充足的档

案性，乃至一种难得的史话性。其二，是由文本细读与资讯引述构成了一个丰盈的名作大观与茅奖总览。在对第一届至第七届的茅奖获奖作品进行具体评述时，廖四平既寻绎其在题目与内容上的自我发现，又探悉其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创意，力求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客观而全面地掘现获奖作品种种的特色与特点。而且，在评述每部作品时，还引述了大量的相关的评论意见与研究文字，这使得论著在阐释论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的同时，还别有一种

逢也亲切地招呼。还有，就是人的身心之间的和谐，要注意登山的强度要和自然肌体的状况相适应，才能尽得其乐。

杨晓华：泰山的高妙还在于，把艰苦的攀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过程，甚至是人生过程的一种隐喻。当我了解到您的一生经历的时候，我还明白了，坚韧的攀登，其实一直是您生命的基本状况和体验。

杨辛：对泰山的理解，对攀登的热爱，确实和我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我12岁时父母亲就去世。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住在破庙里。16岁到民生轮船公司做学徒。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搞“疲劳轰炸”，几千人闷死在重庆较场口防空洞，死难者的尸体在朝天门码头上堆积如山。为了打日本鬼子，后来我和中学的同学报名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又和同学逃跑到昆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后考入北平艺专上学，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就投奔冀察热辽解放区，参加革命。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汤用彤先生把我从吉林调到北大，从此就一直在北大教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挂黑牌，做过木工、碾煤工。

我的人生确实就像一种艰难而危险的攀登，虽历尽坎坷，始终追求进步和光明。当我以超脱的心境在泰山的怀抱中攀登的时候，当我到达岱顶欣赏人间的无边景色的时候，我的生命更加昂扬和激越。我90岁时写下人生感悟：“凭艺术而赞美，登泰山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重友谊而贵诚，崇奉献而知乐，爱人民而怀恩。”这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的艺术观。

杨晓华：您对泰山精神的认识和总结，灌注了您美学思想和人生体验。而今，又是什么因素在鼓舞您，以90多岁的高龄，执着于弘扬泰山精神？

杨辛：其实，对泰山精神文化的价值的高度认同和推重，非我一人之心。季羨林先生认为泰山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他认为：“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我个人觉得，泰山虽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神山，披上了封建神权和特权的外衣，但在新的时代，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在新的精神高度对泰山文化加以提炼和概括。

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洪钟大吕，激荡人心。就像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用雷霆万钧、奔腾前进的黄河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一样，我们现在也需要一种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文化坐标，来激扬清浊，提振人心、充实魂魄，弘扬主旋律。泰山是造化之神力，聚自然之精华，续古今之文脉，历万古而弥新，其厚重、包容、和谐、坚韧和自强不息，都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不断砥砺和发扬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都是当代中国需要不断补充的正能量。

对茅盾文学奖的文本解读

白 烨

重要的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优秀作品的遴选上，确是有眼光，也是有预见的。

在我国当代文学的所有奖项之中，以长篇小说为表彰对象的茅盾文学奖，创办的时间最早，举办的年头最长，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最大。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有关这一奖项的史料收集、文本解读与宏观考察等，关注的人不多，研究得也很不够，更谈不上细致与全面。这使得人们要想了解茅盾文学奖的有关状况时，就只能现翻现查一些散见于纸媒与网络的各种文字与资料，而即使如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网”的“茅盾文学奖”专题，也主要是获奖作品目录，别的资讯一概没有。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廖四平的《当代长篇小说的星座——第一至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从一至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了这本专论，有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的评述与研究，就不再是一个空白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选题既适逢其时，又独步天下，堪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着妙棋。

这部研读茅奖作品的著作，不独以选题的补弱弥缺与角度的先人一步而取胜，它在基本内容构成的两个大的方面，还有着其构成而易见的优良与值得关注的意义。

其一，是由具体评介与系统扫描构成了一份独特的茅奖作品基本档案。

茅奖自1982年起评奖，连续评选了8届，涉及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又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社会脉动

密切相连。作品背后，有一定的文学活动支撑；文学背后，又有一定的社会生活依托。因此，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学奖项的茅盾文学奖，其蕴有的内涵与意义，实际上远远地超出了文学奖。在这本论著里，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只缺最新的一届），对茅奖获奖作品依次进行评介，既有较为精细的逐个作品的评述，介绍了每届获奖作品的各自特色，又依循评说，在整体上描述出了茅奖评选的整体演进。在这里，具体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景，不同作品有不同作品的样貌，但总体来看，又有茅奖自身发展演进及其所标志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力行进与一路高歌的基本态势。这种横向上有具体的作品评介，纵向上又有总体的发展情形，使得这部论著在对茅奖作品的评述上，除去其既有的评论性、学理性之外，显然还有一种充足的档

案性，乃至一种难得的史话性。其二，是由文本细读与资讯引述构成了一个丰盈的名作大观与茅奖总览。在对第一届至第七届的茅奖获奖作品进行具体评述时，廖四平既寻绎其在题目与内容上的自我发现，又探悉其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创意，力求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客观而全面地掘现获奖作品种种的特色与特点。而且，在评述每部作品时，还引述了大量的相关的评论意见与研究文字，这使得论著在阐释论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的同时，还别有一种

我 very 看重也很期盼这部以茅奖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文学著述的撰著与出版，我也对作者廖四平充满敬意与谢意，因为他别具手眼，因为他雪中送炭。

